

最近,围绕圆明园的话题似乎格外的多。圆明园流失的文物在英国拍卖,预计拍出高价;“圆明园首届金秋皇家文化节”开幕;“数字圆明园”发布,重现昔日胜景;圆明新园对游客免费开放。一时圆明园又成为了公众焦点。



# 【万园之园】—圆明园 耐人寻味的劫难史

万园之园的圆明园是中国人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痛。它是清朝帝王在150余年间创建和经营的一座大型皇家官苑,于1860年的10月遭到英法联军的洗劫和焚毁。可以说没有哪一座园林像圆明园这样为国人所熟知。但很少有人知道这座“万园之园”身后却有着更耐人寻味的故事。

## ■烧炕取暖法让清代宫廷火灾加剧

圆明园为什么到1860年才被烧?这个问题问得好像有点奇怪,但其实不然。众所周知北京是明清两代王朝的帝都,可是今天还能见到多少明代的宫廷、园林建筑?它们都哪去了?答案是很多都被烧毁了。

明代宫廷火灾多,尤其是永乐、正德、嘉靖、万历年间的数度大火,无数宫殿、园林毁于烈火中,甚至累及造成全国性的灾难。因中国古代多木质建筑,皇城內木质结构尤多,房屋高大,稍有不慎,往往星火酿成大火,势不可挡。北京地处北方,冬季天气寒冷,必须烧火取暖,这就成为了火灾的一大火源。

到了清代,火灾也偶有发生,但规模、频率,损失相比于明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。原因在于,满清崛起于关外,在辽东苦寒之地生存,御寒取暖是个大问题,生活中他们学得了“烧炕”的独特本事。

满人将宫殿的墙壁砌成空心的“夹墙”,俗称“火墙”。墙下挖有火道,添火的炭口设于

殿外的廊檐底下。炭口里烧上木炭火,热力就可顺着夹墙温暖到整个大殿。为使热力循环通畅,火道的尽头设有气孔,烟气由台基下出口排出。而且这种火道还直通皇上的御床和宫殿内其他人睡觉的炕下面,形成了“暖炕”与“暖阁”,使整个宫殿都感到温暖如春。

道光皇帝曾有一首诗,详细描述了地炕结构。诗曰:

花砖细布擅奇功,暗松松针地底烘。  
静坐只疑春煦育,闲眠常觉体冲融。  
形参鸟道层层接,里悟羊肠面面通。  
荐以文茵饶雅趣,一堂暖气着帘栊。

这种坑道取暖极大地减少了火灾发生的概率,很多宫殿、园林因此得以保全。集南北地域、东西国度建筑形式于一体的圆明园也不例外,它可以在长达一百五十余年间不断地得以修缮和发展,得益于其安全良好的供暖系统。

## ■“火烧圆明园”历史并没那么简单

谁“火烧圆明园”?这个问题连小孩子都知道:1860年10月在英法联军司令额尔金勋爵的命令下,侵略军火烧了世界上最大最美的皇家园林——万园之园的圆明园。这当然没有错,但历史并没那么简单。

英法联军在攻入北京之前曾有过休战,联军派遣以外交官巴夏礼为首的谈判队伍与清廷和谈。但以僧格林沁为主的朝廷官员曾

折磨来使。在英、法的强烈要求下,清政府才释放了幸存的19人。这成为联军放火烧掉中国皇帝夏宫的一个主要借口。

在放火烧圆明园之前,额尔金在北京张贴了告示,说明了烧圆明园的原因和预定的放火时间:“任何人,无论贵贱,皆需为其愚蠢的欺诈行为受到惩戒,18日将火烧圆明园,以此作为皇帝贪食之惩戒,作为违反休战协定之报复。与此无关人员皆不受此行动影响,惟清政府为其负责。”即使要报复,又何必抢掠?显然,英法联军是以此为自己洗脱。

## ■谁为英法联军引路有待考证

按照清朝官方史料记载,是著名诗人龚自珍的儿子龚孝拱为英法联军引路,并指挥那些士兵如何放火,但这一说法有待考证。

那么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呢?其实并不需要有人引路,当时清军且战且退,一路退至圆明园,所以如果要说是谁引的路,那就是清军自己了。恭亲王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说:“我军不战而溃,败兵纷纷退至圆明园,夷匪亦街尾而来。”英法联军就是这样到了圆明园的。

英法联军在放火前先进行了两天的抢掠,掠走了大量珍宝。当然也不能否认,当时驻守西郊的一些八旗兵的散兵游勇以及地痞恶霸也去了圆明园……局势平息后,这些文物珍宝大都被清廷收缴回。

## ■圆明园成为废墟火烧只是第一劫

更令人难过的是,圆明园这座被誉为“万园之园”的人类文化遗产在1860年受到英法联军的“火劫”,只是灾难的开端。当时珍贵文物遭抢掠,绝大多数建筑被烧毁,但山形水系并未被破坏,方壶胜景、蓬岛瑶台等多处水中景观还相当完整。

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,清政府对圆明园再度失去控制。园内大小树木被砍伐殆尽,建筑、木桥的柱子遭锯断。躲过英法联军洗劫的幸存建筑物被拆毁,但山形水系幸存。

清帝逊位后,进入北京的军阀,把圆明园作为建筑材料场,能做建筑材料的東西几乎全部被搜尽。后来在北京主政的张学良为其父建陵园时,就曾命人从其中拉走诸多石料。经过此劫,一些残存建筑全成过眼烟云。

民国时期,一直幸存的圆明园山形水系遭到“土劫”。农民曾住进圆明园,为发展生产,建造房屋,他们挖山取土。20世纪80年代初,2000多户人家住在有耕地、工厂、打靶场的圆明园里。至此,整个山形水系被破坏。

后经多年努力,国家收回了原属圆明三园地域范围内的全部土地使用权,园内全部住户和绝大部分驻园单位迁出。2000年,《圆明园总体规划》获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复。

(据《北京青年报》文/陶海)

# 古代中国的厕所往事

近日,北京修订的新公厕标准,拟将北京的男女厕位比例,从现有的1:1改为1:2。  
在中国厕所史上,古代也非常重视公共厕所的建设。公厕何时分出男厕女厕的呢?

## 1.早期公厕多建在道路旁

不必讳言,厕所与食堂一样,是人们每天都要去的地方。学术界有种观点认为,最先出现的是公厕,又叫官厕。中国最早的公厕,是建于道路旁边的“路厕”。

《周礼·天官》记载:“官人,掌王之六寝之修,为其井匱,除其不蠲,去其恶臭。”意思是官人专门负责给周王打扫房间卫生,建厕所,清除不洁之物,消除臭气。所谓“匱”,就是厕所,又称“匱”。

东汉学者郑玄把“匱”解释为路厕,清代学者王念孙则认为“井匱”是隐蔽的厕所。

先秦的公厕已有选址和建筑标准。《墨子·旗帜》中称:“于道之外为屏,三十步而为之圜,高丈。为民溷,垣高二尺以上。”所谓“屏”,就是围墙作厕;“溷”则是古人对厕所的另一种叫法。

围墙周长“三十步”,超过了40米;高一丈,超过了2.3米。这是军人使用的厕所,如果是民厕,围墙则高达一丈二,超过了2.7米。这么高的围墙,想偷窥是很困难的。

## 2.汉代已有水冲式座厕

从史料看,周代的厕所已设有漏井,秽物可自然落下池内,近代学者尚秉和就此在《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·溷》中认为其“颇与今日之洋茅厕相类”。

现代考古已发现了不少古代厕所。在河南商丘芒砀山梁孝王刘武墓中,便发现了一处卫生间,内有完整的石质座便器,可以用水冲洗。此厕距今2000多年,被认为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水冲式厕所。

2009年,笔者曾前往考察梁孝王墓,看到座便器的正后方墙上,还凿出了一条冲厕的水管,蹲位旁边有石质扶手,设计相当人性化。

后来,在满城陵山中山王墓、徐州狮子山、骆驼山楚王墓等已发掘的汉墓中,笔者均看到了“厕所”,厕所旁边往往还有配套的“浴室”,显示出古人科学的卫生观念。

梁孝王墓的厕所,属于有钱人家的高档厕所。而普通厕所一般是挖一个很大很深的

坑,筑墙围成厕,俗称“茅厕”、“茅房”。

《左传·成公十年》说,晋侯“将食,张,如厕,陷而卒”,晋侯即晋景公,在饭前觉得肚子胀,上厕所,一不小心掉进粪坑淹死了,可见粪坑之深。

## 3.西晋豪厕被误为主人卧室

《晋书·刘寔传》记载,西晋富翁石崇家的厕所,装潢考究,超级豪华,且“有绛纹帐,衾褥甚丽,两婢持香囊”,方便后还要换上新衣服。刘寔是朝中重臣,也没见过这样的厕所,还以为进了石崇的卧室。刘寔不习惯,最后找普通厕所方便。

东晋大将军王敦第一次上妻子武阳公主(晋武帝司马炎之女)家的豪华厕所,闹了大笑话,被南朝刘义庆收录于《世说新语》中:厕所内放着用来塞鼻子的干枣,王敦以为是供如厕时食用的,全吃了;出厕所时婢女端来洗手的肥皂水,他当茶水一饮而尽。

明末清初佚名小说《掘新坑怪鬼成财主》描写浙江湖州乌程县的农民穆太公建了三间公厕,里里外外装潢得比乡人的卧室还干净舒适。又请人题诗作画,张贴于墙壁上,“登一次新坑,就如看一次景致”。

凡来上厕所的,还可免费得到手纸。不少女士也上这样的厕所,于是穆太公又盖了一间女厕所。他看准了“厕所经济”,靠卖大粪发了财。

## 4.汉代厕所已经分男女

古代厕所,很多时候男女共用,只讲“先来后到”。但从现代考古出土文物来推断,至少在汉代,厕所已分男女。

在陕西汉中市汉台区,曾出土西汉末年王莽时期的“绿釉陶厕”。这座陶厕有房顶,山墙一侧开有两个门,厕所里有墙分隔,门外亦有一道短墙,区分男厕与女厕。

考古中还发现将男厕与女厕分开的设计。中国农业博物馆的藏品中,有件汉代陶厕,猪圈两边各建一个厕所,应分别为男厕与女厕。但古代的女厕位不会多于男厕位。这是古代女性外出活动少,社会活跃程度低的反映。现在北京计划男女厕位按1:2来设



西汉末年分男女的绿釉陶厕(汉中博物馆藏品)

计,说明女性的社会角色已经“翻身”了。

对厕所的数量,古人按口比例考虑。明戚继光《练兵实纪》是这样记述军厕的:“每马军一旗(每旗辖三到五个队,每队11人),每车兵二车(每车24人),各开厕坑一个。”

## 5.汉代出现“厕所管理员”

除了《周礼》记述的“官人”,传说中最早有名有姓“看厕所的”,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淮南王刘安。

《太平广记·神仙》说刘安死后升天途中,遇到天仙时犯了“大不敬”,被罚给天庭看了三年厕所,才成了长生不老的仙人。虽然这是神话传说,但却反映了古代厕所所有专人管理的事实。

在清代,出现收费厕所,这与现在增加女厕位比例一样,也算是桩新鲜事。《燕京杂记》记载,当时“北京的公共厕所,入厕者必须交钱”。“入者必酬一钱”,并可拿到两片手纸。为了揽“生意”,厕主往往还会做广告,在厕外张贴大幅吸引人的布画,竖广告牌,上书“洁净净房”字样。厕所里还会摆上小说等书籍,供如厕者阅读,争取“回头客”。

“一钱”,即一文钱。当年的苏北,25文可以买到一斤鲜鱼,可见那时在北京如厕不便宜。不少人干脆不上厕所了,“人都当道中便溺”,以致那时的北京城卫生很糟糕,连打进来的八国联军都看不下去。

(据《羊城晚报》文/倪方六)

## 宋代已流行“饭后水果”

现代人虽然对饭后吃水果习以为常,甚至还被误以为这才是“现代生活”的一种象征。其实,古代许多饮食方法,其见识、其花样、其时尚等,都会令现代人折腰。大宋王朝城市居民中晚餐桌上,吃完主食便上“水果拼盘”。

众所周知,大宋王朝是当时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,其京城更被普遍认为是旧时最繁华的大都市。这些,《清明上河图》和《水浒传》、《宋史》等许多古画古籍都可佐证。大宋王朝的市场上也不断涌现新、奇、特的玩意儿,食物也日益丰富。市民对饮食的要求不仅由一般的味道美转向意境美,而且对食物的审美情趣也扩大到视觉之上。“水果拼盘”的出现并流行,似乎就能让现代人领略到宋代市民饮食“色香味美”相互交融的艺术氛围。宋代城市居民对水果的需求量非常大,在食品店,水果与饮食几乎是平分秋色,即一半对一半。孟元老在《东京梦华录》中专门标明的《饮食果子》就是一证。从饮食节次上,一般都是正食之后,必上水果。

史载,由于当时的运输障碍,宋代“水果拼盘”中也包括了晒制的干果片、香药果子等,种类繁多,卖水果的小商小贩也特别多。“子夜时分的东京街头常见他们叫卖的身影”,而支撑水果商贩的是“果子行”。这一点,创造了“目录学”这个词的宋代状元苏东坡的文字记载可以证明。在他记述他祖父——宋代天文学家、天文机械制造家和药物学家苏颂行状的文字中便能窥见一斑:“苏颂曾雇一婢女,此女一家十口住在曹门外,无其他职业,专为果子行锤取石莲肉度日。她说像她家这样专供果子行的就有数十家之多,夏天要锤莲百十车……”以此推算,水果在宋代城市饮食中可谓产销两旺。而这种局面的形成,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,但不可忽视达官贵人对水果的喜好和推崇。

比如产于江西的金橘,原先东京市场难见踪影。后来,由于备受自己宠爱的温成皇后特别喜欢吃,即便历史上名声颇好的宋仁宗赵祯为博美人欢心,也不得不运用权力把江西的金橘调到开封。很快,金橘就在京城饮食市场红火起来。而且,针对运输不便,东京市民很快发明了绿豆藏金橘的“保鲜法”并推广之。

《东京梦华录》还列举宋代城市盛行的一种名叫“蚌”的美食,就是由一个小官吏一次献出千余罐“鹤掌蚌”引发的。这些真实的历史记载表明:贵族口味的好恶,对城市居民舌尖影响很大,这也符合饮食发展的规律。

(据《北京青年报》文/赵柒斤)